

書 評

高 桂 惠*

王瓊玲、胡曉真主編

《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425頁，ISBN 978-957-08-3446-8

一個議題的設定與開展往往牽涉許多面向，《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一書試圖透過諸多面向的討論來勾勒「經典」，此書以四個大方向展開：經典的生成、經典的閱讀與詮釋、經典的轉化、朝向現代性。誠如王瓊玲在導言一所言：「經典」議題面對當代文化研究由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甚至消費文化的視角轉化，牽涉到「中心觀念的衰落」問題，以及文學場域與權力場域相互關係之問題等等。然而，王瓊玲更關注文學批評家親自介入重塑文學史的工作，探討真正奠立文學研究的可能性，而不被社會學所取代。因此本書從會議論文研討到出版的過程中，乃致力於文學研究方法、理論與視野的拓展與突破，以促進明清文學研究。

此外，胡曉真在導言二由世情小說的經典《紅樓夢》與《金瓶梅》作為本書一些論文的潛文本，指出諸篇論文作者藉由不同的小說文本，各以特

2010年11月15日收稿，2010年11月27日修訂完成，2010年12月3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Kao Kueihui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殊的角度處理上述二經典所已經開展的欲望、日常生活、女性命運及自我認知、家族敘事與國家敘事等普遍的主題，透過敘事技巧、敘事觀點（或說視角）、細節的處理，呈現出明清敘事文學不斷進行經典轉化的過程。整體而言，本書所蒐錄的十三篇論文以及前面兩篇導言，帶領我們重新回到文學現場與學術語境的深刻反思中，再一次回顧我們的文化土壤如何舖育、涵化經典。

綜觀全書，共十三章，茲簡介如下：

第一章〈「四大奇書」——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譚帆）。本章指出明中葉之後，隨著小說傳播的盛行，文人對小說文本的介入，也直接間接地將如「四大奇書」等文本推向經典化的歷程。作者從五方面進行觀察：從評點的立場，文人以本身的前理解有效地干涉一般讀者的閱讀取徑，型塑出某種「經典閱讀」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使該版本得以盛行；從內容、形式來看，對小說情節、詩詞等增補或改訂，使文本形式趨向穩定的狀態；以思想的角度切入，當時諸多文人修訂本，如毛批、金批，更突顯了明代文人的關懷主要在於道德與政治，有其背後深植的儒家傳統；在藝術層面，許多細節的加工，更可使人物形象飽滿、語言也更為精緻；從功能來看，小說實成為文人寄託情感、意識的重要載體。四大奇書的經典化與文人介入有密切關係，此一文化品味，既可看成文人對通俗小說的一次價值認可與理論批判，屬於明代中晚期的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中國通俗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

第二章〈淫辭艷曲與佛教——從《西廂記》相關文本論清初戲曲美學的佛教詮釋〉（廖肇亨）。從佛教詮釋為論述基礎，廖肇亨教授探析觀劇時可能的思維與面向，試圖勾勒出晚明清初的文化圖像，提供觀看戲劇美學與佛教文化互動關係的新角度。作者從具體史料出發，發現寺院與觀劇、高僧與作曲，是清初禪門習見之現象。最重要的是，禪師們往往強調禪法與戲曲本質上的趨同：劇場為開悟之載體。作者以金聖嘆、尤侗為例，透過天台學說「十界互具」的框架討論《西廂記》的文本，顯題化為當時對「情／理」、「夢／覺」、「虛／實」課題之深入觀察，以及文人的遊戲筆墨與禮教制約的互動。

第三章〈欲的凝視——《金瓶梅詞話》的敘述方法、視覺與性別〉（陳建華）。作者透過「凝視」此一兼具「視點」與「觀點」的動作，觀察《金瓶

梅詞話》如何透過看與被看間對象的挪移，將讀者帶入人物的內心世界，將性別與欲望具體透過潘金蓮展現。作者指出《金瓶梅詞話》是一種「眼」的寓言，本文作者透過敘事方式的分析，指出：在對欲望深刻凝視的同時，也是一種從欲望的眼光閱讀《金瓶梅詞話》，當兩種視域交錯融合，許多內在於具體感官的種種課題，如情色、道德、文化等，遂在我們眼中逐一展開。

第四章〈「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論《桃花扇》評本中批評語境之提示性與詮釋性〉（王璦玲）。由於明中葉以降，評點作為一種閱讀形式，使得戲曲的傳播與接受方式轉變為「演出」與「書籍傳播」並重，甚至創造一種特殊審美風尚，型塑最通行的版本。王璦玲教授集中由孔尚任透過交遊圈之間的傳播所交織出一特殊的「批評語境」著手，藉著介入閱讀的方式，製造「詮釋性閱讀」的示範，以達成對《桃花扇》詩學的審美觀照。批語之作用展現於「約括全劇的藝術特色」與「總領人物、提示筆法」兩方面。《桃花扇》評本於每齣之間的前後脈絡，細細歸結每首曲、每闕詞之旨趣意味，均能具體提點出孔尚任之新意與創發。於明清之際的緊張氛圍下，此劇透過歷史的反省重新架構一個追問明朝何以滅亡之歷史情境，而此「興亡之感」又不同於遺民心態，其核心價值乃點出孔尚任面對當下與歷史時，以每齣戲的人物與對白，後設地直陳主觀寄託：「藉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

第五章〈《閱微草堂筆記》與中國敘事傳統〉（陳文新）。作者由傳統四部分類各有其獨立的敘事傳統的角度切入，主要體現於敘事方式與材料的選取兩部分。就《閱微草堂筆記》而言，因紀昀有意的區隔，使其子部敘事之特點得以突出，作者以為此乃紀昀有意建立一套有別於紀傳（史部）、傳奇（集部）的敘事規範。就敘事視角而言，子部小說與史書最大的不同在於多用「限知」敘事，其最重要的使命是「論」，也就是傳遞思想和知識，敘事本身只是策略，故對過度虛構導致缺乏合理性頗有批評。而傳奇之本性在於以集部的修辭方式改造史家傳記，可知不同敘事傳統之間的差異所在，子部小說上銜「寓言」一脈，雖允許一定的虛構限度，卻不以「引人入勝」為首要目的，紀昀對於道德勸懲更為注重，突顯其「淑世」的寫作立場。

第六章〈女性讀者眼中的《鏡花緣》〉（魏愛蓮 Ellen Widmer）。首先認定《鏡花緣》是一部具有詮釋開放性的作品，從性別的角度出發，魏愛蓮教授觀察《鏡花緣》題詞者之性別與閱讀偏重之間的關係，發現男性多從哲思（忠

孝美德)或士不遇的立場去詮釋小說中諸多女性的際遇,而四位女性題詞者卻有不少人將線索聯繫至《紅樓夢》,對紅顏才人的個人特質與不幸命運有較多筆墨,透過女性的友誼網絡,預示了清代中晚期女性更為樂觀地看待自身處境的轉向。作者指出沈善寶視《鏡花緣》為對《紅樓夢》的修正,反映了十九世紀女詩人群體在面對女性處境上的普遍轉變。

第七章〈從《賢愚經》到《西遊記》——略論佛教「祇園」母題在中國敘事文學裡的轉化〉(李爽學)。本章主要討論變文與白話小說之間的傳承關係,透過觀察祇園此一佛教母題,如何從《賢愚經》轉化至〈降魔變文〉,最後變形為《西遊記》中的故事情節,藉以具體說明中國敘事文學對佛教母題的敷衍。從《賢愚經》至〈降魔變文〉之改易來自俗講僧的想像與創造力,表現在形式部分,可看出「情節布局」與「娛樂效果」兩部分的藝術效果,然而,由〈降魔變文〉至《西遊記》則來自思想內涵的改造,最直接的表徵在於「融入中土思想」、「呈現宗教互動的狀態»,同時敘寫中也不乏對宗教「略帶遊戲筆墨與微諷»,上述變化都是為了增強小說文本的可讀性。《西遊記》處理祇園母題的模式,乃佛教與中國敘事文學混血的結果,兼具文學史及宗教史上的意義。

第八章〈悲劇、喜劇,再回歸到悲劇——〈鶯鶯傳〉、《紅樓夢》及其間的經典轉化〉(陳大康)。作者看似欲解決中國古代愛情故事之發展,實則在處理才子佳人題材於敘事模式上之演變。透過情節結構的分析,大致可以區分為〈鶯鶯傳〉、《西廂記》、《紅樓夢》三階段變化,三部文本也成為系列作品之經典。〈鶯鶯傳〉奠定此故事類型之基本構成要素,《董西廂》與《王西廂》則修正〈鶯鶯傳〉中張生拋棄鶯鶯的結局,使之趨向喜劇,減低門閥制度與功名觀念之強調。清初延續喜劇脈絡,特別反映出情欲與禮教的衝突,卻翻轉元明中篇傳奇的縱慾傾向,務以獵奇搜新為要。作者以為強調「離奇」是才子佳人小說消亡主因,也是曹雪芹反覆批判之處,《紅樓夢》之糾反策略為「不追求夫榮妻貴的團圓結局」、「人物各有個性,非格套化的扁平人物」、「回歸現實,具有高度生活真實感»,上述三點看似迥異才子佳人小說,卻也吸收其中不少情節要素。

第九章〈晚明文人鄧志謨的創作活動——兼論其爭奇文學的來源及傳播〉(金文京)。本文以鄧志謨為例,欲藉由說明鄧氏文學創作中最具特色之

「爭奇類」作品，討論該類型之來源與傳播等問題。作者先就創作者背景，點出鄧志謨之爭奇作品似與編纂大量類書有關，同時也認為鄧志謨與湯顯祖等人交識，身分為不遇書生，此際遇可說是晚明從事小說創作文人之典型。接著具體分析七部爭奇作品，其特色可歸納為三點：「內容必為兩造爭持，待仲裁者調解後，和平收場」，「形式則詩詞文賦眾體並陳，書中有書」，「反映當時文學創作與出版業息息相關的社會景況」，前述特色與民間遊戲文學有密切關係。就傳播角度，作者從日本保留鄧志謨六種爭奇作品出發，推測禪院男色風氣及其相關創作與《童婉爭奇》應有關係。同時也指出日本文學中如《茶酒論》、《勸世文茶酒四問》等作品，顯示此主題的日本化，作者認為此一民間文學的隱流，何以在晚明時期的鄧志謨身上「破地而出」，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十章〈中國古代的「清官」文化及其省思〉（林保淳）。作者試圖由「清官」作為中國文化中抑揚各半的特殊現象，透過較為開闊的視野進行觀察，企圖爬梳箇中內涵。首先藉由字義說明「清」的詮解路徑有二：一為道德層面，如「清廉」，一為能力層面，如「清明」。在儒家強烈道德主義影響下，產生「法制道德化」之傾向，於是要求理性公正的「法」，便與執法者的品格相連結。從「清官」關心的往往是犯人是否招承，至於是否符合「清」之特質，實非首要。「文本清官」與「現實清官」數量上的反差，突顯中國政治制度上的結構問題，或因公案小說「善惡分明」的設計，或因人民對官僚系統已無能為力，清官的酷虐往往被忽略，這促使我們反思「清官文化」的弔詭性。事實上，清名與清明應是清官的充要條件，小說的刻意偏重正突顯「清官」崇拜的盲點。

第十一章〈酗酒、瘋癲與獨身——清代女性彈詞小說中的極端女性人物〉（胡曉真）。由《再生緣》建立女性彈詞小說的敘事傳統後，「女英雄」成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出發，以《玉連環》中的極端人物：酗酒的母親、瘋癲的妻子、獨身的女兒，探討此文類內部典範的確立與轉化問題，目的在於觀察女性對於自我認知、生命型態以及對世界的理解。胡曉真教授透過小說人物極端的手段，指出這正是女性面對自身處境時不得已的權衡，無論是藉酒嬉笑怒罵，佯狂瘋癲，甚至採取激烈手段來維持獨身，其背景與評價往往來自於社會充滿「道德趨向」的目光。《玉連環》中的異化人物是自我與

他者重要的參照，是一種多重的對話關係，無論酗酒、癡狂或獨身，這些衝撞傳統價值與社會規範的極端人物，既為「女英雄」的對手，同時也是替身，她們的出現不但豐富彈詞文本，也是建構彈詞小說的重要環節。

第十二章〈《兒女英雄傳》中的無為丈夫和持家妻妾〉（馬克夢 Keith McMahon）。作者描繪了一個與《紅樓夢》、《金瓶梅》相對的家庭圖像，《兒女英雄傳》藉由一夫多妻之家庭結構，有悖於過往擁有多妻之男子多為風流才俊的設定，突顯堅毅才女對維持社會與家庭秩序穩定的力量。柔弱男性與聰慧女性的組合，延續並突顯《紅樓夢》中賈寶玉身處女兒堆的形象，作者認為是文康創作《兒女英雄傳》時有意規避指涉清末國力衰退的失落，用以強烈否定當時環境的失序。另一方面文康也透過淡化「情」與「性別倒置」來批判《紅樓夢》，藉由女性管理男性的精神與物理世界，將俠女須先行雌伏，轉化為理想的妻子，才能讓男性臣服於女性的控制，作者稱此一過程為女性代理（female agency），並進而聯繫十三妹與早期現代小說的革命女性之相承關係。

第十三章〈晚清小說的現代性追求：以公案／偵探／推理小說為探討中心〉（陳俊啓）。本章先針對西方現代化與晚清以降的背景，討論被視為傳統的公案小說以及休閒的偵探小說，是否也同樣具有「現代性的追求」？作者認為晚清以降公案小說的出現，展現清朝自身的法律制度已經走到必須依靠體制外的力量協助維持秩序與道德倫常的地步，鮮明地體現當時價值系統的弔詭樣貌。於是當翻譯的偵探小說引進後，不但滿足了中國人對新奇事物的好奇，梁啟超等人更希望以此體驗啟迪民智。在五四反傳統的氛圍之下，與「感時憂國」相異者，往往被排除在「現代化追求」的範圍外，不過仍可看出現代小說在技巧上獲益於偵探小說，儘管未能完成當初引進的目標，但敘事技巧等部分仍與近現代通俗文學之潮流密切相關。

整體而言，本書在議題設定、聚焦以及環環相扣的展題和論文的編選上深具眼光，正如王瓊玲在導言中站在一個「重寫文學史」的高度來看經典化問題，本書不同角度的研究，不期然的正好引出了許多有意味的思考，然而，透過上述諸文我們也看出若干問題值得再扣問：

首先，如果由「作者論」來看，究竟「文人」、「才子」與僧團，乃至於追求現代化的「知識份子」等等，他們曾經歷了何種「自我脈絡化」問題？

如譚帆教授所指出的經典生成過程中「文人化」，其背後深植的是儒家傳統及文化品味；廖肇亨教授提供觀看戲劇美學與佛教文化互動關係的新角度；王璦玲教授亦指出孔尚任透過交遊圈傳播所交織出特殊的「批評語境」有其深沉的個人處境與家國之思；金文京教授的論文，所呈現的鄧志謨爭奇小說所流溢出來的民間文學的隱流；陳俊啓教授文中點出鴛鴦蝴蝶派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等被排除在現代化追求的小說題材，是何者決定這些通俗小說與翻譯小說的接受狀態？不同文化身分作家介入的創化，對於文學賦予價值流動的作用力絕對是一個複雜的課題，如果再加上上層文人與下層文人之間對於雅俗觀念的移動、變化是否也會造成「經典化」意涵的變動？凡此，究竟是一種對於傳統文人價值的顛覆或者是擴大其內涵的變動？對此，本書諸篇論文也許有意無意之間碰觸了作者意圖的課題，但是可能需要更仔細的推敲其所面對脈絡化過程中價值與品味流動的處境，而這些正是我們「重寫文學史」無可避免的必要環節。

過猶不及永遠是學術研究一個非常不容易的問題，同一個「脈絡化」的考量，有時也會衍生出另一些研究策略值得商榷之處。如林保淳教授〈中國古代的「清官」文化及其省思〉一文第二節挪借不少西方對於「法」與道德權威的討論，並從傳統語境字源學的分析出發，自先秦諸子對治人與治法之論述展開討論；李爽學教授〈從《賢愚經》到《西遊記》——略論佛教「祇園」母題在中國敘事文學裡的轉化〉一文，行文中屢屢將《西遊記》對比西方宗教文學，隱然將其視為宗教文本；陳俊啓教授〈晚清小說的現代性追求：以公案／偵探／推理小說為探討中心〉一文，先針對西方現代化與晚清以降的背景進行說明、定義，下啓晚清小說對現代性的追求與回應，這些「背景式」的鋪陳，可能會引發論述的有效性與失焦之疑義。溯源與派生性的勾勒圖程，往往因研究者的分類、命題，打造出特殊的「重塑模式」，在經典的模塑過程中其溯源與派生必須映照諸多不同的框架，小說作者對原生文本的理解與認知，及其對派生文本的指認系統，的確錯綜複雜。研究者如何為文本及其背景聚焦出更貼切的文學（或文化）原生態，的確是經典轉化議題最艱難的工程之一。因此，如何由西學切入中學，或者研究者對背景知識的裁剪當如何進行，對我們判讀「經典」生成與轉化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引導，對此，研究者應當更有自覺。

此外，由新的學術視野所開啓的經典思考，突顯出女性意識、感官經驗等種種特殊焦點，有時是深具顛覆性的，這對經典轉化的觀察帶來什麼影響？如陳建華教授探討《金瓶梅詞話》如何透過看與被看間對象的挪移，帶來視域交融的種種課題；魏愛蓮教授觀察《鏡花緣》題詞者之性別反映了十九世紀女詩人群體在面對女性處境上的普遍轉變；馬克夢教授指出《兒女英雄傳》的俠女雌伏及男性男童化的社會現象；胡曉真教授指出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彈詞作品對女性自我抉擇的可能性更爲開放，這些都是非常具有創見的學術觀察。但是，我們若進一步追問：如以胡曉真教授「極限版」女英雄爲例，當男女互動關係成爲一種文本中的現象，充滿了男性對「(特殊)女性」的想像與建構，被極端化了的婦德框架的確促使女性必須嘗試突破規範，重新檢視秩序，不過這也突顯性別研究的困境，首先會以「被異性（或公議）認同」的方式出發，但在此秩序上站穩腳步後，隨即會被異化爲「英雄」，反而削弱了性別在爭取平等時付出的努力。如果說反抗是一種自覺意識，則文學手法上的「擬男」或「閨音」顯然都是表現自我的取捨，但其傳播多少具備一定的娛樂效果，特舉極端人物是否也可以視爲滿足好奇心與吸引讀者的策略？如此一目的成立的話，則如何判準諸如女性意識、感官經驗等新的學術視野所開啓的經典思考？事實上，中國文人不但以穩定的制度框架侷限「他者」，同時也自我侷限，上述這些觀察引出有關文學與文化的互動問題，無形中突顯了學界對於「經典」與「非經典」的刻板印象，但是對於傳統性別意識的超穩定性結構之顛覆效果，似乎也不宜過於樂觀。

經典如何才能獲得在文學史地位的相對永恆，除了繼續審視每一個文學個案經典化的過程，也當指出文學之所以成爲文學的某些內在制約與特性，並不斷將其置於更廣大、更普遍意義的文學與文化共識中考察，使經典得以成爲更具體而開放的載體。本書蒐錄當今學界的學術成果，在不同面向進行激盪與反思，雖然有些論述礙於會議的主題與篇幅仍有未盡之處，但就整體而言，仍透過明清敘事文學的具體研究，對經典轉化這一課題取得有效的貢獻。